

在行走和书写中重建心中旷野

尤 鉴

看点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不仅仅是一位作家，更是一位行走文学的践行者。多年来，阿来用脚和笔丈量世界，认知内心。他攀行在雪山之间仰望苍穹，行走在旷野之中凝视花草。阿来新作《去有风的旷野》收录了十个行走往事，十个把心交给旷野的故事。阿来说，行走与写作是他的宿命，他通过行走笔记把读者引向广阔的精神空间。



作家阿来让双脚真实感受泥土，让眼睛永远清澈，让耳朵听见山野呼啸的风。作为茅盾文学奖获得者，阿来不仅仅是一位作家，更是一位行走文学的践行者。《去

有风的旷野》收录阿来的十个行走往事，十个把心交给旷野的故事。在他的笔下，无论是四姑娘山的秋景、米仓山脉的云海，还是稻城亚丁的岩石，都不仅仅是自然风光，更是在探讨人与自然、人与自我的关系。他说，行走让我们认识世界、深入世界、呈现世界，这样人生才能走向开阔。

通过行走，阿来进行文化寻踪，“我不是来寻找答案。我来倾听，来感触，来思考。来证实，今天在别处上演的，在这里曾经上演过的种种复杂的文化现实。”回望当年的古战场，如今草色弥天，牛羊蔽野；他在墓碑遗迹旁，细数生息不息的族群与文化。他在行走中发现了旷野诗意、诗性、诗心与诗情，“为过往的历史存真，为消逝的生活留影”。

阿来的脚步抵达民间，“旅游，观赏，是一个过程，一个逐渐抵达、逼近和深入的过程。这既是在内省中升华，也是地理上的逐渐接近。所以，我愿意把如何到达的过程也写出来，这才是完整的旅游。”通过行走，阿来进行自然教育，置身其间，一切都凝固无言，只感觉造化的伟力，只感到地老天荒。在莫格德哇，他躺在草地上静享世界无声，山峙水环。“伟大的自然之书就摊放在他面前，他需要做的只是翻动书页而已。”“大自然有时候能给人提供一种慰藉，所以我总是要抽时间从河谷地带的人文社会出去，经过人间，最后到没有人间的中天中去，那是自然界的生息不息，它的美丽会给你安慰。”通过行走，阿来歌唱大地的神奇庄严。在稻城亚丁，他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棵香气充满的树，“吃蔬菜让人觉得自己是一个人，吃肉觉得自己成了某种凶猛动物。吃饱了蘑菇，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棵树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，但我确实觉得自己成了一棵香气充满的树。而在树下，一场细雨后，拱破泥土，生出了那么多的蘑菇。”“我走向了宽广的大地，走向了绵延的群山，

走向了无边的草原。”不管是在文学之中，还是文学之外，阿来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宏伟的存在对接起来。

作为一个从大地上走来的作家，阿来始终拒绝让快节奏的生活将自己的人生打断，在他看来，人生是一个漫长、缓慢的感受进程。“时代在以我们并不清楚的方式加快它的步伐，总有一个声音在催促，快，快！却又不要告诉我们哪里是终点，是一个什么样的终点。”阿来以一个他者的身份，去探险种种奇遇，把心交给旷野，每每深入一片土地，心中的速度便自然降下来。“一个小时走5公里和一个小时飞720公里，看到的東西是截然不同的。”地球有的是时间，阿来把自己融入自然中，获得无限张力，思想在旷野中飘荡，天地都进入他的笔记中，缓慢，从容，不慌不忙。正如诗人惠特曼所写：“不必赶路，要感受路，我们成为大树，树干，树叶，树根，树皮，我们埋藏在地下，我们是岩石，我们是橡树，在旷野里并排生长。”

作家马伯庸说，“阿来对于自然的理解，对于自然的亲近，一定并不仅仅是局限在思考上，他一定会身体力行。”多年来，阿来始终将行走和写作视作自己的宿命，他攀行在旷野之间，任群山的波涛把他身体充满，抬头仰望苍穹星际，俯身凝视花草生灵。阿来曾呼吸川藏稀薄的空气，听到高原日出的鸟啼，创作出《尘埃落定》《格萨尔王》等作品，写出震撼人心的文字。

阿来的文字有一种植物的质感，主要源于他探索大地的视角。他的文章无一不聚焦花草树木，每一次漫游，都是一次高原花草的追踪。在他的手机和电脑硬盘里，储存了数万张植物图片，堪称“作家中的植物学家”。作为一位植物学的痴迷者和博学者，阿来在所有文章中无一不聚焦花草树木。阿来说：“我是一个爱植物的人。爱植物，自然就会更爱它们开放的花朵。”在《去有风的旷野》中，阿来细致描述了棘豆、风花菊、香青、蝇子草……他爬

上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，对每一株看似无名的花草如数家珍。他记录自己趴在地上，把镜头对准一株贴着地面匍匐生长的豆类，“用肉眼打量，再端起相机细细打量。不同的距离，不同的视点。”看它们呈现形状不同的叶与花。

莫言曾评价阿来“如果世界文学是一个百花园的话，那阿来的创作是这个百花园中具有特色的引人注目的一朵。”他们一起旅行时，阿来对植物的了解程度曾令莫言惊讶，后来莫言还为阿来写了一首诗，开头便是“欲知草木问阿来”。著名评论家李敬泽也称赞：“阿来是一个博物学家，他对自然充满了热爱和敬佩，有一种凝视和珍惜。”

正因为阿来对大地有着与常人不一样的爱意与执着，他希望能够记住这块土地的所有，包括每个动物和植物的名字。“我们在大地上行走，首先需要下功夫了解它的地理史、文化史，知道这些生命体的名字，才能书写这片大地、获得个人和社会的生命体验。”他的文字因此有了另一层质感，风景不再是人物活动的“背景板”，鲜红的杜鹃、紫色的马先蒿、蓝黄相间的鸢尾，生机处处；云杉、白桦、杉树、松柏，郁郁如海。他的文字总有一股自然的野气，穿行于群山之中，头顶蓝天，看冰川消融，赏古树繁花。

行走中阿来认为重要的是感受和思考。“我孤身而行……一路觉得很过瘾，好多问题好像能够得到解答。从低地往高处走，都是大山大河。”“人看到的不只是美丽的大自然，也能看到自己深藏不露的内心世界。”读阿来的文字，会发现并非真正的出走才叫“抵达旷野”，有时候，旷野就在生活中间。他的文字处处透露着人生哲学与豁达。好的旅行写作，不仅能够呈现那些遥远而新鲜的风景，让读者通过文字的介质感受旷野之息，也能经由作家笔下独特的山脉水文，将生命看作一次山重水复的旅程。

他用“二重证据”撑起城市人文史

陈华筠

从城市史到人文史，年过七旬的作家、学者薛冰把南京古城讲得那么美，重述了南京3000年人文演进历程。薛冰新著《烟水气与帝王州：南京人文史》撑起一座都市人文史的建构，融合南京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城市发展等诸方面的成就与内涵，南京文脉清晰立体起来。

作为六朝古都，南京历史积淀极为丰厚，人文荟萃。继《南京城市史》探索南京的城市生长脉络之后，这本长达70万字的《烟水气与帝王州：南京人文史》既有专业的深度，又生动、可读，文史兼美。薛冰结合实地踏勘，对一些问题有理有据地重新解读，尽量准确地勾勒出南京文化的绵延脉络，并一点一点化为具有温度的文字。长干古城在本书中的位置十分突出。第一章第一节题目就是“长干古城：千古之谜”，这样开门见山的布局与标题，足见薛冰对它的高度重视。书中

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讲述长干古城的故事。长干古城虽然年代久远，却不见于传世文献载录，只能依靠考古发掘的文物证据。而在长干古城基础上建起的越城，则有传世文献作为见证。越城俗称“越台”，因是越人所建且建于一块台地之上而得名；相传它是辅佐越王勾践灭吴的谋士范蠡所筑，所以又名“范蠡城”。这两个地名已见于《建康实录》和《景定建康志》，这是南京现存最古老、最完整也是最重要的两部地方志。从这两部书中可以看出，直到六朝时期，越城依然是南京城攻守的重要军事据点，是兵家必争之地。这一方面的传世文献记载，如今终于得到了考古发掘的证明，作者身临其境的描述，平添了几许亲切感。

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，研究古代历史文化需要“二重证据法”，就是将“地下之新材料”与“纸上之材料”相互验证。所谓“纸上之材料”，主要是

指传世的各类纸质文献；所谓“地下之新材料”，既包括出土文献，也包括出土文物。薛冰新书的显著特色之一，就是自觉运用了“二重证据法”，将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新知，与传世文献相结合。这种方法的运用，不仅丰富了本书的史料，开阔了作者的视野，也激活了读者的联想和思考。

薛冰写了“越王勾践的雄图霸略”，因为南京建康史就是从越城算起的。大多数南京史志都只是简单记载越城的建造年代、位置和周长，很少涉及越国建城的具体目的，而不深究其背后实际隐藏着越王勾践的雄图霸略。《景定建康志》卷二十引《金陵故事》，说到越国“欲图伯（霸）中国，立城于金陵，以强威势”，却是语焉不详，没有具体展开。薛冰根据南京处于“吴头楚尾”的地理位置特点，结合马王堆帛书《繆和》《韩非子·说林》和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等文献材料，论证“越

城的功能，正是作为防范楚国的一个前沿阵地，其战略意义在于及时掌握楚军的动向”，眼光开阔，很有见地。

3000年的南京人文史上有很多有趣的话题，也有许多待破解之谜。周泰伯奔吴的故事是否可靠，金陵王气的传说内涵何在，莫愁湖名称的来历如何等等，不一而足。这些话题故事性很强，经过数千年的辗转相传，难免掺杂后人的增饰和想象，真真假假，费人猜详。要重新审视这些古老的话题，也有必要将“地下之材料”与“纸上之材料”相结合。广为流传的“泰伯奔吴”的传说，既是吴文化起源研究的核心问题，也与南京人文史有密切的关系。薛冰新书不仅将这一传说作为南京史和吴文化史的重要问题来考察，更将其置于整个中国上古史的背景下提出自己的看法，其间所使用的“二重证据”，无论是“地下材料”还是“纸上材料”，都颇为可观。

追访唐朝诗人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

姜苒苒

■提示

唐五代文学研究学者、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继去年出版的《我认识的唐朝诗人》斩获文津图书奖后，近期又推出《我认识的唐朝诗人2》，内容更见开拓。陈尚君坚持现代传记文学立场，全面立体呈现唐朝诗人形象，打破文学史中对诗人或概括或片段的描述，对诗人生命过程进行“全景式检索”，让他们从历史云烟中走出来。书中生动还原了唐代社会、文化的样貌。



对于唐朝诗坛的璀璨群星，我们也许熟悉其脍炙人口的诗作，但对他们隐没在历史风尘中的人生历程知之甚少。事实上，每位诗人都有着卓异不凡的性格禀赋与独特鲜活的浩瀚人生。但除了为数不多的诗坛巨擘有翔实的传记记载，其余大量的唐朝诗人都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，只能在许多文献中找到简单零碎的记述，想要透彻地了解他们的故事，必须对其生命旅程进行“全景式检索”和“沉浸式重访”。

陈尚君曾自嘲为“唐朝户籍警”，认识的唐人比现代人还多。他孜孜不倦地进行唐诗研究40余年，曾出版著作《唐五代诗全编》。《唐五代诗全编》堪称超大型断代集成文献，按传统古籍分卷共1225卷，50册，收录诗人4200余人，诗作5.5万余首，逾1800万字。陈尚君以目录学为导向，在各种目录对比中寻觅蛛丝马迹。古籍文献的散失如陨石坠落，碎片散落在群书中。只有方法得当，搜寻仔细，才能在前人开垦过的园地里另辟天地，“100%的可靠和只有1%的可能，都在反复选择权衡之中”。

写作《我认识的唐朝诗人2》，陈尚君是以孩童的心态来写唐朝诗人的，透着怜惜悦性的趣味。他从正在编次的4000多位唐代诗人中，挑选最能写出曲折离奇、惊心动魄故事的诗人。陈尚君感叹，虽有难度，但写的过程则很顺达，感受诗人的喜怒哀乐，自己的感情也会跟随着高低起伏。

陈尚君在文学研究生涯中，始终坚持“文学就是人学”的观点，认为如果在文学研究中看不到一个鲜活的人，读不懂他们的内心，不能理解他们的欢喜与痛苦，与研究对象就总会有隔膜的。陈尚

君在书中讲述了每位唐代诗人的真实境况，关注他们在一生中经历了哪些事件，遇到过怎样的挫折，在困境中如何奋发图存，并如何在作品中传达他们的心声。

打破文学史中对诗人或概括或片段的描述，陈尚君坚持现代传记文学立场，全面立体呈现诗人形象。他观照诗人的生存状况，研究诗人所处阶层、家庭出生、成长经历、读书进学、科考入仕、仕途从宦、来往交游、经济来源、生活安定与动荡等等，从中呈现出唐代社会、文化的情状样貌。

写诗是唐人最普遍的表达方式，在陈尚君看来，每位诗人都从属于他所处的时代，并受时代条件限制，不能将其作品从时代中抽离出来孤立看待。在《我认识的唐朝诗人2》中陈尚君分享了帝王、官吏、文士等身份的唐朝诗人的故事。

无论声名、功绩、身份地位，“如实还原传主一生的人生轨迹”。陈尚君行文饱含深情，以心通应古人，还原诗人真实的人生经历和独特的性格禀赋。让诗人带着他们各自的春风得意、失意困顿、悲欢离合、生离死别，从古旧的纸张中，从历史的云烟中走来。

从世人瞩目的大家到存诗一句的小家，在《我认识的唐朝诗人2》中所写传主既有耳熟能详的帝王将相，如李隆基等四位君主、冯道等三位宰相；亦有熟知但非真知的另类人物，如作为弃儿、伶人、诗人的茶主陆羽；还有鲜少听闻的“新鲜面孔”，如推动李杜齐名的狂生任华、历经曲折终得成名的闽南文宗黄滔。

陈尚君是一个细致入微的旁观者，充分利用诗人们的文集、日记、书信以及同

时代人的相关记录，对其外在行为和内心活动进行观察。同时他又是一位清醒的考察者，透过表象分析内在的逻辑与原因，给出全面立体的述评。比如，他写“诗人张籍与白居易的交往始末”，这样写道：一般读过文学史的读者，都知道张籍、王建是元白新乐府运动的羽翼，似乎彼此有共同的文学主张与密切的交往。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都有特别的过程，就张籍来说，他一生交往最密切的是韩愈，可以说是道义相勉，生死不渝，白居易则认识很晚。就年纪说，白居易较他小好几岁；就科第说，他登进士还比白居易早一年；但就元和初年的诗名和官位来说，在他盘桓下僚之际，白居易远远超越了他。不过张籍不是意气用事的人，白居易表彰他的诗，他也很受用。他们结交虽晚，但维持了二十多年的友谊，可一一叙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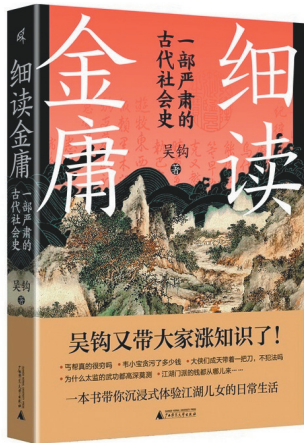
在“杜甫与高适的友谊”一章中陈尚君通过二人的存诗，书写了他们友谊的发展过程。杜甫比高适小12岁，天宝三载杜甫与李白、高适同游梁宋时，李白的才气纵横，高适的英雄情结，让杜甫不免成为陪衬。从二人交往诗文中可发现，性格、地位差异都不能撼动二人的友谊。诗圣杜甫与为人处世的真诚与炽热，对朋友的尊重与理解，荣耻不变的友好与深情，尤为可贵。

陈尚君致力于文化普及，希望把诗人们拉近到我们当下的生活中，为读者展现一个活生生的、人与之神交心会。他曾不无感慨地说：唐诗看似似被研究透了，但存世的很多唐诗根本没人读过，凭凭海量唐诗来研究唐朝，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。

■聊书

除了武侠 我们还能这样读金庸

李海卉



金庸的江湖世界里，还隐藏着哪些社会史细节？金庸笔下江湖浩渺，英雄辈出，那些刀光剑影、家国天下的故事，早已成为文化符号，影响着一代代读者。今年适逢金庸百年诞辰，宋史研究者吴钩呈现了金庸江湖的另一重现实。在虚构的武侠世界背后，真实的历史场景是怎样的？吴钩在新书《细读金庸：一部严肃的古代社会史》中，通过生动的历史细节还原，让我们沉浸式体验江湖儿女的日常生活。

张无忌给赵敏画眉、黄蓉有着一流的厨艺、江湖人夜晚出行的必备神器……侠客们除了快意恩仇，还有不少生活琐事，我们走进了一个更真实、更接地气的金庸武侠世界。

宋朝的江湖为什么那么热闹？段誉的乔、乔峰的酒、曲灵风的花生米，到底哪个才是应该出现在宋代社会的产物？这热闹的背后是极富商业气息与市民气味的城市生活方式。吴钩在书中开启了一场宋朝社会史探索之旅。他借金庸武侠小说中的生动细节，进行社会生活方面的考证，为读者打开一扇观察古人真实生活的窗子。这些故事并非空中楼阁，它们与宋代的社会背景紧密相连，侠客的行侠仗义，正是在那个时代的社会流动性和商业繁荣中孕育而生。

关于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书中提到郭靖第一次请黄蓉吃饭花费了19两7钱4分银两，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，竟相当于2万元。吴钩客观地分析了宋朝的货币与贸易制度，“19两7钱4分的银子，折合成铜钱就是五六十贯钱，相当于宋朝宰相一个月的伙食补贴，大学生五年的伙食补贴，南宋初年的二三场宫廷内宴，也相当于一匹老马、一条商船、一间房子。换成今天的购买力，差不多就是2万元。”以黄蓉点的“四千里、四鲜果、两成酸、四蜜钱”为例，这只是宋代市井美食的冰山一角，开封府和临安府的美食简直数不胜数，吴钩形容今日的五星级大饭店也未必有这么丰富，光是看菜单就让人垂涎三尺。黄蓉接手的丐帮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组织，帮主还极具经济头脑，善于投资，借钱生财。郭靖与黄蓉开启甜蜜生活之后，要如何向黄药师提亲呢？吴钩也在书中准备了一份完整的提亲攻略。

吴钩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宋朝文明，自称这本《细读金庸：一部严肃的古代社会史》是“向金庸武侠小说致敬的闲书”。吴钩通过具体而微的现实细节，丰富了我们对于江湖人物的想象。44篇文章，七大主题，从日常用品到社会制度，从美食饮品到武器武功，以独特的视角深入金庸武侠世界，揭开古代社会生活的层层面纱。吴钩以其16年的研究成果，用轻松诙谐的语言，解释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，还原一幅在大历史背景下人物的生活画卷。这不仅是对金庸小说的一次另类解读，更是一次对宋代社会风貌的生动再现。吴钩直言，“古龙的小说都架空了历史背景，金庸的小说恰恰相反，多数作品都交代了明晰的历史背景，将虚构的传奇巧妙地糅合进真实的历史场景中……”

历史是什么？大仲马说，是用来挂小说的钉子。我们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，发现武侠世界背后的社会史细节。因为有所历史，才呈现了金庸小说世界的波澜壮阔。

■荐书

拾取历史的枝丫

《样范》
作者：龚曙光 人民文学出版社

龚曙光在书中深情地回忆了与韩少功、张炜、黄永玉、钟叔河、唐浩明等十几位文坛名家交往的点点滴滴。所记录的这十几位名家，有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，有“走向世界丛书”的推动者，有电影、电视剧的编剧，有享誉全国的文学评论家以及自成风格的画家……

个人交往视角下的琐屑日常，无论是高雅淡泊中偶尔的入世计较，还是艺术创作中些许的商业投机，或是从容镇定中难免的一筹莫展，都是铸造其样范的另一种真实，字里行间映照出文化和时代的变迁。

《藩镇时代的政治与社会》
主编：秦中亮 上海古籍出版社

本书以“藩镇时代的政治与社会”为题，收录了金滢坤、仇鹿鸣等20位学者探讨中古藩镇的专题论文。文章分为中央与地方关系、权力结构与藩镇性格、河朔割据与举族归附、文本书写与地方社会四个专题，从宏观的国家管理到地方基层治理再到微观的家庭生活，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，聚焦政治制度、社会秩序、聚书书写、交通经济等诸多领域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。在一定程度上，这些论文反映了当前历史学科研究的热点与趋势，对中古藩镇时代国家治理的各个侧面作了积极而有成效的研讨，从而推动了相关学术研究的开展与进步。